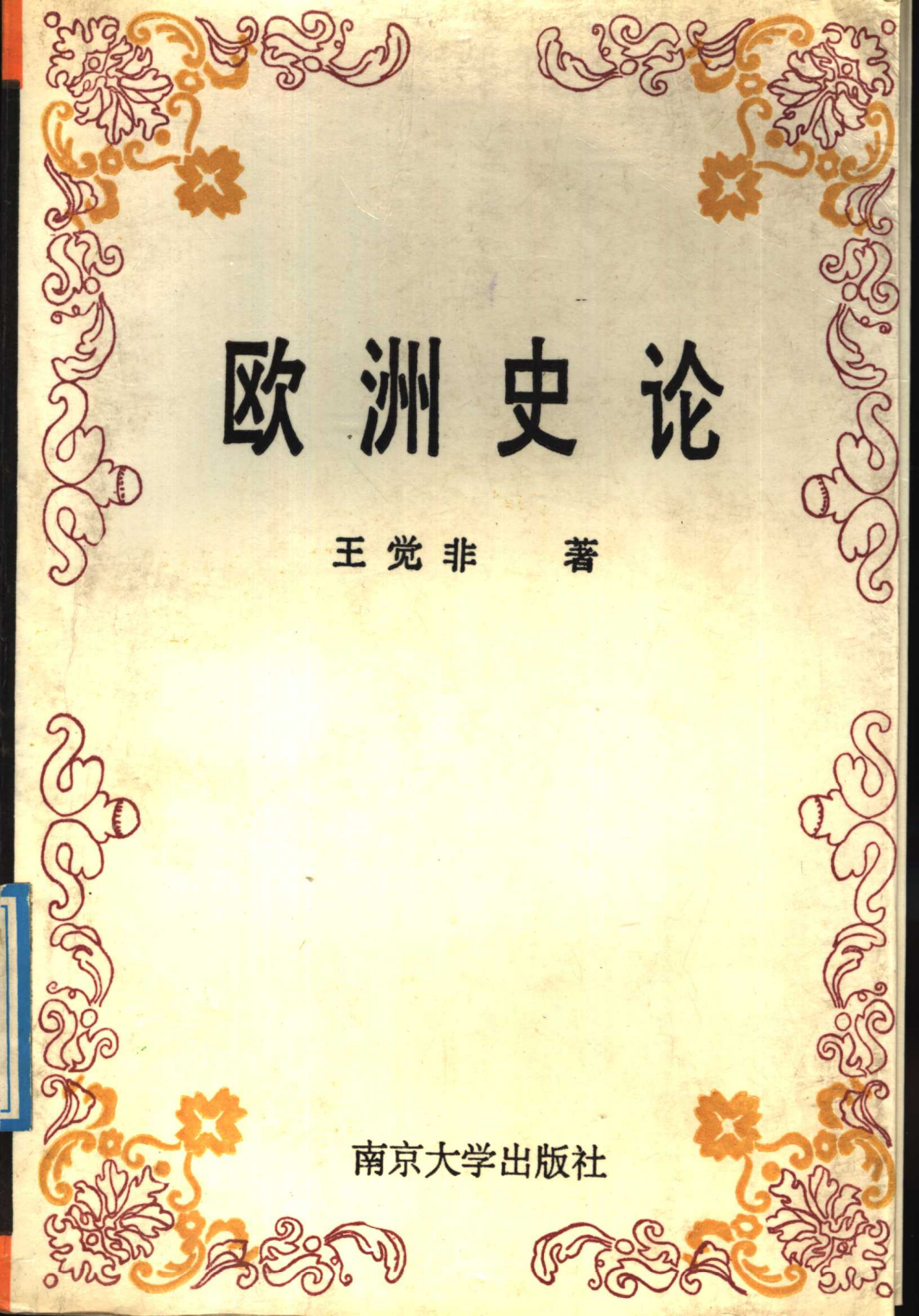




欧洲史论

王觉非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欧洲史论

王觉非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南京

(苏)新登字第011号

欧洲史论

王觉非 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阳练湖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83 千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305-01492-3/K·112

定价: 11.80 元(平)
14.80 元(软精)

前 言

这本文集是著者 30 年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世界历史课程时结合教学而写作出来的。其中部分论文的节录或摘要已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近年来，又将其中一些论文打印为讲义作为研究生阅读参考。但每年打印讲义不但费时费钱，而且打印的错误有增无减。为了便于教学并适应社会需要，特将之辑录出版。

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是从 5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末，跨度为 30 年。其中前 20 年，也就是从 1957 年到 1976 年，正是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动荡不安、每况愈下的时期，也是知识分子惨遭打击和迫害的时期。文集中有些就是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些思想，不得不以间接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但现实生活的体验，加深了我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特别是当谈到历史上人民所遭受到的政治压迫和物质生活的苦难、一些先进人士为了人类进步的事业而遭受残酷迫害时，内心总会激荡起强烈的感情波涛，而对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专制暴政，则感到无比愤恨。这些情况，在有关论文中也有所反映。

回顾往事，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本来正是我辈精力旺盛、思想活跃的时候，本应对社会多作贡献。但这段宝贵年华，却在不断的折磨、摧残中度过了。这本文集中的大部分论文，只不过是在那艰辛的日子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勉力挤出来的一鳞半爪。

著者学识浅陋，论文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尚希读者批评指正。同时由于这些论文写作年代距离较远，在注释等技术性问题上，也有不够整齐划一之处，也望读者鉴谅。

论文的排列，基本上按照有关内容的时代先后为序。

王觉非 1988 年春·南京

目 录

近年来(1976—1986)我国关于欧洲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

问题 (1)

俄国最早的历史著作 (18)

伊凡四世的阴魂为何不散?

——兼谈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30)

当代英美历史家关于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史学思潮 (40)

研究克伦威尔的史学评述 (72)

17 世纪中叶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 (107)

17 世纪英国革命转折时期(1646—1648)的政治斗争 (142)

自由派还是民主派?

——论平等派关于选举权的主张 (184)

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的修正派史学 (224)

18 世纪前半期的俄国史学 (240)

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沙皇政府的国内外政策 (255)

论普加乔夫农民战争 (271)

1812 年拿破仑进军俄国和俄国社会的反响 (322)

拿破仑的历史地位

——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403)

对英国工业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 (411)

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家的史学思想 (438)

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和性质 (495)

加里波第的革命道路 (527)

19 世纪后半期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 (545)

英国历史与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对英国历史研究的回顾 (567)

附：在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代表组委会的报告 (590)

近年来(1976—1986)我国关于 欧洲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在我国，解放前对欧洲近代史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也很少。清朝末年，由于西方列强挟其船坚炮利的优势不断侵略我国，在侵略者蚕食鲸吞的威胁下，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感到中国不仅在武器方面远不足与西方列强匹敌，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西方的“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也比中国的封建专制优越得多。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知识界写作并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各国的著作，如《英国维新史》、《英国国会史》、《法国志略》等，同时还翻译了英国进化论学者和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虽然有些著作的内容显得支离破碎，对英、法等国的历史也只是一鳞半爪的介绍，但当时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先进人士在如饥似渴地寻求挽救危亡之道的时候，这些著作中的微弱的火星，也对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的思想起了借鉴和促进的作用。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各个领域都呈现出百废俱兴、蓬勃发展的局面。世界史的研究和教学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欧洲近代史作为世界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解放后对欧洲近代史的研究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和解放前外国史教学、科研中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唯心主义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发展看作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把这个原理运用到欧洲近代史，那就是要研究欧洲

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衰落的历史。在欧洲近代史的前期(1640—1870),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主要内容;在它的后期(1871—1917),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主要内容。而这也就是解放以来我国关于欧洲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方向。至于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论述,则主要是吸收了苏联学者的著作和他们教科书中的成果。解放后最初十几年中,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学者的著作。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之前,我国关于欧洲近代史的许多论著,特别是教科书,其基本内容和观点与苏联的有关著作无太大的差别。

解放后欧洲近代史著作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批判精神。如果看一看解放以来出版的有关欧洲近代史的论著,就可以发现几乎在每一论著之中都洋溢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不论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对外侵略政策,还是资产阶级在国内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或是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等思想意识形态,都遭到有力的批判。解放前在研究外国问题上的那种殖民地思想和心理状态有了根本的转变。

解放后的十几年,我国对欧洲近代史的研究和世界史的其它领域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论在科学研究、教学、人员培养等各方面,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进步。比起解放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的现象比较严重;缺乏自由讨论、互相切磋、辩驳的风气。在有关论著中,判断历史事件的标准,往往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主要依据,而是以权威和政治领袖的言论为准绳,有些著作常以摘引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和政治领导人的片言只语来装璜门面。加以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有些学者横遭批判和迫害,使得学术界人士对一些社会科学理论问题讳莫如深。

不过,整个来说,从1949年到1966年,虽然随着国家政治局势的动荡起伏,学术研究的状况也出现过几次大波动,但是总的趋向是迅速发展和提高的。但这种形势,到1966年开始的十

年“文化革命”时期，却被完全打破了。在动乱的年代里，只有少数为“四人帮”摇旗呐喊的文章发表。

“文化革命”结束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自由讨论蔚然成风，学术研究日趋繁荣。几年来，关于欧洲近代史的研究，不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欧洲近代历史的文章。在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等学术讨论会上，欧洲近代史也是研讨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文章和讨论会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其中争论较多、提出新的观点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

解放以来，我国历史学界一般都把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关于这次革命，大多数学者在肯定它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开创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它的不彻底和局限性。并且特别强调，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保留了许多封建残余，未能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彻底完成。比起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来，具有较大的保守性。因为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人民结成同盟，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得比较彻底。

上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保守的论点，在近几年受到一些学者的批驳。这些学者认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虽然在政治上实行了立宪君主制，保留了国王和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但是这不过是形式，实际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和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比较起来是最民主的。而且它能够适应社会上各个阶级的要求，有利于资产阶级建立稳定的、牢固的统治，它为以后英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创立了条件。而在法国，虽然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但是斗争激烈，社会上各阶级长期无法保

持平衡，政局一直动荡不宁，使得民不聊生，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影响。在社会革命方面，英国在土地问题上，通过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资产阶级既积累了大量资金，又有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市场。这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小农占优势的农业，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所以不能说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保守。

还有的文章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著作中所以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说成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保守，是受了苏联学者的影响。而苏联学者的观点，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在《评基佐著〈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而来的。但这段话在翻译时未能将马克思的原意准确地翻译过来。文章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是：

“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的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该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

但根据德文原文，应该译成：

“基佐先生感到的大惑所在——英国革命保守性之谜（他对此只能用英国人的绝顶聪明才智来找到一种解释），就是资产阶级坚持同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建立长期联盟。而这个联盟，使英国革命基本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

文章在比较了上述两段不同的译文后认为，马克思的话并非指英国革命是保守的。相反，马克思批评了基佐把英国革命看成是保守的这种错误见解。而我们根据走了样的译文，认为马克思本人也认为英国革命是保守的。这样就造成了历史学中长期流行的不正确的看法。

上述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的同志表示同

意，也有同志对之进行了反批评。进行反批评的同志认为，英国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立宪君主制，国王和贵族的权力仍然很大。在土地问题上，英国在革命时期仅仅取消了地主对国王的骑士捐，而未取消农民对地主的义务。而法国革命的“大扫帚”却将封建时代的残渣彻底扫除。它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完全废除了封建义务，所以不论是在政治上或是在经济上，英国革命都不如法国革命彻底。而且所指两次革命的对比，只能就革命时期而言，不能把长时期的现象（如圈地运动等），和革命时期的措施混为一谈。如果就革命时期而言，无疑，英国革命是不如法国革命彻底的。至于说到对马克思的上述文章的译文，看来，原来的译法虽然值得修改和润色，但是它实质上也未和原文直接矛盾。

有关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和英国革命是否保守的争论，反映了一种思想倾向，即从解放以来，在外国历史研究中有一种左的潮流。认为在历史上凡是暴力的、激烈的行为都是革命的、进步的，反之都是不革命的、落后的，应该加以否定和批判。这种唯左是革、唯左才是进步的思想，在“文化革命”结束后，有了转变。一方面，我国人民几十年来吃够了左倾的苦头，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逆反作用。同时，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大力纠正和防止极左的错误，所以在历史学的许多问题上都反映出了纠正过去左倾思潮的现象。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否保守的讨论也是这种反映之一。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虑——在双方的争论过程中，焦点是英国革命是否“保守”。这样实际上，双方的心目中仍旧把保守与落后划了一个等号。现在我们先不妨换个角度提出问题：在历史上，是否有时有些保守现象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反之，革命和暴力是否有时也有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这就是说，即使承认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保守，也不能从而就认为英国革命的积极因素不如法国革命多。

除了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对比问题之外，关于法国革命本

身的一些问题，也是近几年来我国历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对象。

解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分期，一直是三分法，即：立宪君主派统治时期（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共和主义的吉伦特派党人统治时期（1792年8月10日—1793年6月2日）；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而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雅各宾专政被推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即告结束。同时，一般都认为1789年的这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它和1848年法国革命沿着下降线发展恰成对比。从1789年7月14日攻陷巴士底狱起，先后执掌政权的几个政党，一个比一个革命，一个比一个坚决。对前两者，即立宪君主派和吉伦特派，批判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对雅各宾派，则把它看成是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基本上都是予以积极肯定的。至于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差不多所有的著作都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性质的事件。

上述这些传统的看法，最初也是解放后从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接受来的。而苏联学者的观点则是根据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书中的论述作出的。

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上述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期，他们认为革命的结束不是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而是在1815年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复辟。他们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的分期应以新政治体制的演变和新政治制度的出现为标准。所以他们认为在波旁王朝正式复辟前的热月党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统治时期（1794年7月—1799年11月），以及执政府与拿破仑帝国（包括拿破仑“百日”）统治时期（1799年11月—1815年2月）都应包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之内。

对法国革命时期各个政治党派的评价，也有一些新的观点。有的学者对以前的著作中普遍流行的否定立宪君主派进步作用的想法提出异议。这些同志认为，法国革命时的立宪君主派在摧毁

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功绩应予以肯定。在立宪君主派统治时期，制订了 1791 年的宪法，没收了教会和逃亡贵族的财产，这些都有积极意义。在革命时期执政的三个党派（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中，君主立宪派执政的时间最长。实际上，在君主立宪派的统治时期，已基本上完成了摧毁旧的封建制度的任务。君主立宪派的纲领和政策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一定时期之内，它是符合法国国情的。

关于对雅各宾派的评价，有些文章也提出了和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如以前我国学者大都认为雅各宾派在土地问题上，彻底地解决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本任务的土地问题，但近年来，有的文章却认为对雅各宾派的土地政策不应过分夸大。实际上在雅各宾专政建立之前，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已基本废除了封建权利并已开始着手解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君主立宪派提出的“增加农民土地所有制”这一思想，以及用分期付款来拍卖封建僧侣土地的方式，提供了代替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其意义是不应低估的。文章还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谓解决土地问题，就是指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土地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应放在这里，而不能认为解决土地问题就是使农民基本群众得到土地，并以此去衡量各政治派别在解决土地问题时的彻底与否。

二、英国工业革命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是解放以来我国的世界近代史教科书中和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以前的传统观点是：在讲到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时，都强调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所谓资本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过程。而英国的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相脱离的过程是与圈地运动相联系的。圈地运动从 15 世纪末

开始，一直到18世纪的“议会圈地”和19世纪的“清洗领地”阶段才结束。经过圈地，英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掉了。那些丧失土地的农民，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就为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创造了条件，成为英国工业革命重要条件之一。

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除了剥夺农民的土地之外，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近代课税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等，都起了很大作用。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通过这些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既积累了大量资金，又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因而使英国工业革命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等，都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创立了前提条件。

上述几方面的因素，就是我国在解放以来论述英国工业革命前提时的基本内容。这一论点，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章节为依据的。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深刻地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靠了以暴力为基础的原始积累手段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从而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直接生产者被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

近年来，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又重新探讨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以便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在这些学者所写的文章中，有的在谈到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时，不再把重点放到上述几个因素上，而是提出了一些和以前不同的论点。这些论点是：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政局一直比较稳定，同时英国政府执行了奖励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等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些都对英国的工业革命起了促进作用。同时，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鼓励吸收外国技术，大量外国的先进技术传入英国，对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资本主义是很大的推动。英国有很多部门从引进的技术中得到益处。这些都为英国工

业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以前我国的历史著作都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业革命后，英国生产技术的发明，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个是工业革命后引起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化。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等级瓦解、消失了，原来社会上众多的小生产者纷纷沦落为无产者。手工工场和手工业中的中间阶层，有的成为大生产中的资产阶级，有的破产。社会关系日益两极化，社会的基本矛盾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现代无产阶级以其在生产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随着大生产的不断发展而必然发展的特点，必将担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革命。因此，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恩格斯）

但是近几年发表的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文章中，都不是仅仅强调英国工业革命后现代无产阶级诞生的重大意义。有的文章提出要对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进行再评价。因为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产生了一个无产阶级，同时，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工业革命的意义远远超过人们原来对它的估计。在人类发展史的长河中，曾发生过两次意义重大的经济革命，一次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4000年之间，从原始的采集经济和渔猎发展到定居农业和畜牧业，以后渐渐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这次经济革命，使人的物质生产开始有了剩余，社会分工日益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少数人得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以从事智力活动和社会管理工作。文化、艺术也得以开始发展，各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逐一出现，人类文明史翻开了第一页。但是那时由于生产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上人均收入不可能达到人人温饱的水平，所以社会的发展是以少数人剥削大多数人为基础的。

18世纪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的第二次经济革命。这次经济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又开创了一个新

时代。由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按人均收入计算，已完全可以达到人人温饱，不愁饥寒的水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的发展，已不再必须以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为条件了。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有了物质基础。如果说，从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社会过渡到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是第一个否定的话，那么从工业革命起已到了“否定之否定”的时代。

从另外方面的角度来看，由于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命，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以及电讯等逐一发明，使人际关系、国际来往日趋密切。以前在古代、中世纪，人们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国与国之间，更是山川阻隔，彼此茫无所知。现在则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互相联系。地球好像变得越来越小，真是天涯若比邻。人的活动甚至越出了地球的范围，把脚步踏上别的星球。过去，世世代代的思想家所向往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境界，已隐约显现出了轮廓。

不过，上述这些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并未变为现实。现代工业发达的国家，贫穷现象仍然存在，而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穷人人数一直未有降低，贫富悬殊日甚一日。暴力事件、犯罪行为和失业现象更是工业化国家一直未能治愈的痼疾。这些弊病的产生，可以说，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就已种下了祸根。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所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和普遍流行的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为荣的社会风气，虽然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进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另一种偏向就是金钱第一、物质享受至上。就像古希腊寓言中那个酷爱黄金的国王迈达斯一样，人们企图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黄金。

这些文章指出，现在我国正在实行工业化，同时“第三次浪潮”又已向我国袭来。当此之时，我们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应该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三、德国统一问题

19世纪中叶德国的统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1864年的普、奥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来实现的。解放以来,我国的历史著作中,对这条统一的道路,抱着批判否定的态度,认为在19世纪中叶德国统一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可能的道路。一条是自下而上地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彻底肃清封建残余,使德国的资本主义顺利地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而无产阶级又不够成熟,不能很好团结,以致这条革命的道路失败了。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把德国各地区统一起来。通过这条道路统一起来的德国,势必会保存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不利于德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事实上,德国是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以王朝战争的方式实现了统一。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用铁血手段,先后击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把德国统一起来。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政治上是个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经济上,在农业中实行了一条“普鲁士式”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即在农业中保存容克贵族的大量封建权利,农民忍受长期封建残余的剥削和压榨。所以这条德国统一的道路具有反革命性质,对这条道路的推行者“铁血宰相”俾斯麦所起的反动作用,应加以批判。

上述论点,近来受到一些同志的批驳。这些同志在文章中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统一唯一可能实现的只有王朝战争这一条道路。德国在通过王朝战争统一起来以后,消除了分裂的局面,虽然未建立起共和制,但是对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仍然非常有利,它属于历史的进步现象。至于俾斯麦,他以强有力的手腕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实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愿望,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顺应了当时德国历史进步的需要,因而